

《孟姜女变文》残卷的缀合、校录及相关问题研究

刘 波 林世田

一、敦煌本孟姜女故事文献研究综述

孟姜女故事为我国源远流长的民间故事,习见于历代歌咏诗文。敦煌文献中就有多种孟姜女故事文献。

P.5039号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中拟名《孟姜女变文》^①。王重民等校录的《敦煌变文集》收录该卷。随后,该卷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注意,中国小说史、戏曲史、民俗史等领域的研究者们尤其关注这一文献。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周绍良等《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重加校录,录文更加精审。将该卷认定为变文,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关于该卷的性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周绍良认为该卷“体裁与变文基本相似,只是没有我们所能找出变文的特征”,将其归入“诗话”类^②。程毅中认为该卷“体制与标准的变文(如《汉将王陵变》)略有不同。它虽是散韵相间,诗文结合,但文的部分却是押韵的四言句,实际上是赋体”,将其归入“故事赋”一类^③。

P.5019号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中推测其似为孟姜女变文。可能是因为残缺过甚,195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集》中并未收录该号^④,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亦未收录。迄今为止,P.5019先后有两种录文发表。高国藩《论敦煌写本中孟姜女故事的形成和价值》一文中发表了P.5019的录文,同时指出:“伯5019是一篇不知名的残卷,卷面暗黑,字迹不易辨认,而且残缺太甚,只能认出

①《伯希和劫经录》著录P.5039号为“残文一片(十三断行似为孟姜女变文)”,P.5019号为“孟姜女变文(卅九行)”。缩微胶卷与此后出版的图录均显示,《伯希和劫经录》实将此二文献的著录倒置。这一疏忽致使众多著作将这两件文献的卷号混淆。

②周绍良:《唐代变文及其他》,见《敦煌文学刍议及其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91页。

③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④王重民、启功等先生编辑《敦煌变文集》时,即已注意到该写卷。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新近入藏的启功先生《敦煌变文集》手稿中,存有该号的录文。

一百五六十字。”^①该文校录错误较多,难以卒读。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有P.5019的录文,其校注第一条称“伯五〇一九胶卷,勉强可读,但原卷卷面甚暗”^②。《校注》的录文是该号迄今为止最为精善的校录。不过,由于缩微胶卷不够清晰,录文尚有某些缺陷,从而影响了文本解读的准确性。《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刊布了该卷更为清晰的图片,因此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对其重加校录,为学术界提供一个更为准确的校录本。

1991年,荣新江从英国国家图书馆斯坦因所获敦煌遗书残片中,发现S.8466与S.8467两件文献内容与孟姜女故事相关,并据文中“榆林长城”、“秦王”等词,推测其为《孟姜女变文》的前半。S.8466首尾下均残,存26行;S.8467首尾上均残,存23行。两件纸质、书法均同,应为同一写本的割裂^③。项楚、宁可、张鸿勋均有校录发表。关于这一文献的性质与定名,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其一是认为它以七言诗句咏唱为主,夹有散说,属于说唱结合、散韵相间的变文,并认定它为《孟姜女变文》的前半。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为张鸿勋^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两件文献为诗词类作品。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将其放在文人诗歌中与边疆有关的闺怨诗下论述,认为它“有可能是长篇孟姜女韵文的一部分”,“从残诗的语言风格看,不像是民间作品,而像是初唐骆宾王、卢照邻、刘希夷一类人的长篇歌行一体”^⑤。宁可将这两件文献称为“孟姜女诗”,亦认定其为诗歌类作品,并认为其“诗辞较工,与孟姜女变文、捣练子的风格不一样”^⑥。由于这一文献残缺严重,学界对其性质与内容很难获得一致的认识。

敦煌文献多个写卷中保留了与孟姜女故事有关的诗歌作品。P.2809、P.3319背、P.3911载咏孟姜女故事的《捣练子》曲四首,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P.2809著录为“杂曲子七首”,P.3319注“背有孟姜女小唱残文”,P.3911著录了曲名“捣练子”。此四首曲子词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饶宗颐、戴密微《敦煌曲》,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均有校录。

左景权在《敦煌词曲识小录》中首先校录出P.3718卷背与孟姜女故事有关的曲子词六则。其后,饶宗颐、戴密微《敦煌曲》,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均

①高国藩:《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0页。

②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62页。

③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94页。

④张鸿勋:《新发现的英藏“孟姜女变文”之意义》,《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2期,第108-111页。又,《新发现的英藏“孟姜女变文”校证》,《敦煌俗文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5-259页。

⑤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86页。

⑥宁可:《敦煌遗书散录二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6页。

有录文。任、饶二先生就其中二曲的校录有过激烈的争论,潘重规续有订补^①。

除上述写卷之外,我们调查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BD11731 号残片也与孟姜女故事相关,并可与 P.5019 号缀合。

二、写卷概述与缀合

BD11731 号残片宽 24.9 厘米,高 27.2 厘米,上宽下窄,残损严重。纸质厚而疏,为归义军时期敦煌本地生产的纸张,写卷应即抄写于归义军时期。正面残存文字十二行,为较端正的行楷字体,字迹清晰。前六行每句连写,后六行句与句之间空一至两个字。背面为毛笔所绘图画一幅。

P.5019 号残片宽 22 厘米,高 25 厘米^②,残损严重。正面残存文字十三行,字迹端正清晰;背面为毛笔所绘图画一幅。《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拟名《孟姜女变文》,并为此后众多目录与著作所沿用。

经过认真的比对,我们发现 P.5019 号与 BD11731 号可以缀合(见图 1)。缀合之后,撕裂处原来一分为二的“晓夜”“乡”等文字得以清晰呈现。背面图画拼合之后,成为一幅相对完整的变相(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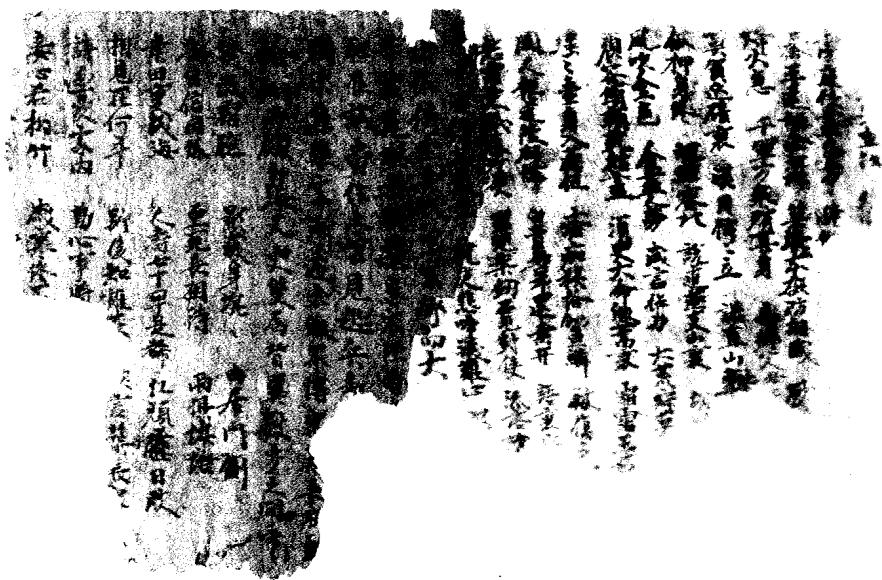


图 1:P.5019 与 BD11731 缀合图

①潘重规:《敦煌写本曲子孟姜女的震荡》,见《敦煌词话》,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1年,第3-7页。

②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v.4.P.483.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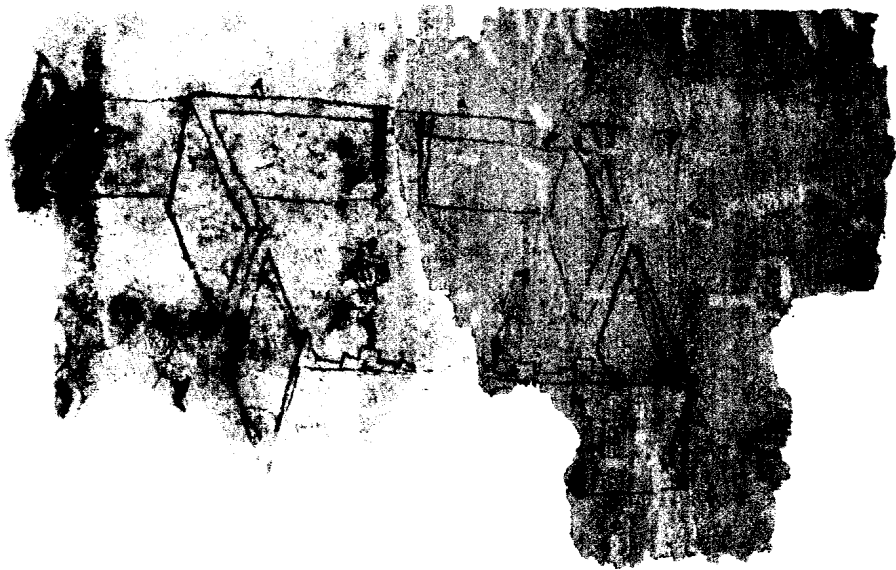


图 2: P.5019v 与 BD11731v 缀合图

三、校录

本录文为 P.5019 号与 BD11731 号缀合之后的内容,部分文字与文句原割裂为二,今得以拼合;录文尽量保持原卷格式,按原行录出,不连写,亦不注行数;原卷残损部分视其位置,标“(前缺)”、“(后缺)”；残字或字迹模糊而不可辨识者以“□”代之,可辨识者则补入,并外加“□”以示慎重;俗字径改为正字;讹字、通假字照录,后加括弧注明正字;对部分字词的校录与意义,以注释方式略加说明。

(前缺)万重泣。□(后缺)

虏庭役尽人生力^[1]。撻□(后缺)

秦王远托金河^[2]北,筑城本拟防胡贼。砂□(后缺)

烽火急。千军万众殒其身,帝乡^[3]父母□(后缺)

莫贺延碛^[4]里,汉月停停立。诺直山^[5]上(后缺)

被押身终,魂埋塞北。说道燕支山里,胡□(后缺)

风吹金色。食尽人劳,咸言并力。大荒寂寞,(后缺)

颜容憔悴干枯尽,须臾大命皈(归)蒿里。霜沾玉面(后缺)

强强^[6]台(擡)身入薏位^[7]。疮痂秧垓(浹治)^[8]如鱼鳞,被伤之(后缺)

闺人报道徒相忆,白骨无年还桑井。语里□(后缺)

愁云爱^[9](暖暱)^[9]胜沙漠。男儿案剑觅封侯,流落沉(后缺)

杞梁^[10]处役甚难辛,晓夜悲啼泪难止。□(后缺)

休作倚坐长城,望家乡而大^[11](后缺)

苦处先登，无时暂息。不经旬□（后缺）
 驰准试，当作之官见逃兵，却^[12]（后缺）
 犹未息。离家渐远，求皈（归）不得。还□长城□（后缺）
 恰似两剑分张^[13]，又更双雁背翼^[14]。数步之间，啼
 泪流沾臆。影灭身死，由（犹）居门侧。
 各自信因缘，至死长相待^[15]。两俱凄怆，
 桑田变成海。人寿七十早是稀，红颜随日改。
 相见在何年，别后知谁在。□言筑长□，
 请勿忧家内，勤心事^将（后缺）
 妾心若松竹，岁寒终^不（后缺）

笺证：

[1] 力、色、忆、息、翼、臆、侧，并入声职韵字；北、贼、得，并入声德韵字。职德同用通押。

[2] 金河：河流名。北方有多条水道曾名金河，比较重要者有二：一即古芒干水，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大黑河。《隋书·突厥传》：“大业三年，炀帝幸榆林……亲巡云内，泝金河而东，北幸启民所居”。一即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南摩楞河。《新唐书·地理志》夏州塞外道大同城：“北经大泊，十七里至金河。又经故后魏沃野镇城，傍金河，过古长城。”

[3] 帝乡：指地处中原的故乡。

[4] 莫贺延碛：古亦称沙河，现名哈顺戈壁，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

[5] 诺直山：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认为“直”当为“真”之讹字，其山当在诺真水流域一带。《新唐书·地理志》：“夏州……又东北至诺真水汭。”诺真水即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北之艾不盖河，诺真山应即位于今艾不盖河附近。

[6] 强强：勉强。

[7] 蒹位：蒹，疑与“庐”通。庐位，疑指临时住所。

[8] 殃洽：通“浹洽”。意为遍及。《文选·司马相如〈封禅文〉》：“休列浹洽，符瑞众变。”刘良注：“浹，及；洽，遍。”

[9] 爱猷：下一字右半部原裂为二，拼合后仍难以认清，右半部声符“代”清晰。“爱猷”，通“暖隄”，意为昏暗不明貌。《楚辞·远游》：“时暖隄其曛莽兮，召玄武而奔属。”洪兴祖补注：“暖音爱，隄音逮。暗也。”

[10] 𣎵梁：上一字右上角残，左旁及右下角笔画清晰，似即“杞”字。

[11] 本行或断作“休作，倚坐长城望家乡，而大”。未知孰是。

[12] 本行语义难以索解，姑试断句如此。

[13] 分张：分离。李白《白头吟》：“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分张。”参见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分张”条。

[14] 背翼：犹言分飞。

[15] 此句换韵,待、海、改、在,并上声海韵字。

四、关于《孟姜女变文》的几个问题

BD11731 与 P.5019 缀合之后,残文篇幅更长,保存的信息更为丰富,这也为厘清与这一写卷相关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基础。

1. 该文的内容

P.5019《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拟名为《孟姜女变文》,这一拟名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敦煌宝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等多种目录与图录沿用。我们认为,从残文中出现的人名“杞梁”与筑城等情节以及写卷背面的变相等因素来看,这一拟名应是很准确的。

不过,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深表怀疑。高国藩认为,这一残卷并不像《孟姜女变文》残断,原因有二:“第一,此残卷后有一幅图画,长城的门开着,内外有两个男人,不是孟姜女找丈夫。第二,‘男儿案剑觅封侯’^①,是中间的重要情节,与孟姜女故事无关。这两个疑点不排除掉,很难确定它便是《孟姜女变文》残段。”^②

高氏提到的第一点,我们认为并不成为怀疑的理由,因为与变文相配合的变相极有可能类似于今天的连环画,将同一故事的不同场景绘成多幅图画,我们不能因为该部分图画所绘不是孟姜女寻夫,便轻易否定该文为《孟姜女变文》的可能性。高氏提到的第二点,确为本文的一大疑点,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男儿案剑觅封侯”一句,富有苍莽豪迈的英雄气概,有典型的边塞诗风格,类似语句常见于唐代边塞诗。杜甫《复愁十二首》之一:“胡虏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闾阎听小子,谈笑觅封侯。”高适《送兵到蓟北》:“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王涯《塞上曲》:“塞虏常为敌,边风已报秋。平生多志气,箭底觅封侯。”这些诗句中,“觅封侯”多指征服外族、建功边关的事业,与杞梁被迫修筑长城,确实有一定的差距。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文中出现的“燕支山”“金河”“汉月”,也是边塞诗中常见的意象。唐诗中常用“燕支”来泛指北地、边地。李白《王昭君》之一:“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李白《代赠远》:“燕支多美女,走马轻风雪。”“金河”常借指战争之所。上官仪《王昭君》:“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柳中庸《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贺朝《从军行》:“金河未转青丝骑,玉筋应啼红粉颜。”“汉月”则为身处边关的将士用以借指故乡的典型意象。杜甫《前出塞》之七:“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

文中多次出现的边塞意象,显示该文受到了边塞诗作的深刻影响。初盛唐时期,国力强盛,太宗、玄宗等几代帝王都大举拓边,大批士人走向边塞,幕府

①“使”当为“侯”字,高文校录有误。

②高国藩:《论敦煌写本中孟姜女故事的形成和价值》,《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第210-211页。

中更招揽了大批文士,在这一背景下,唐代边塞诗的创作非常繁荣,流传也较广。该文能吸收边塞诗的影响,有其内在的原因:其一,孟姜女故事本身与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密切相关;其二,敦煌地处边陲,居民与戍卒较容易接受描写边塞生活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还有文中提到的莫贺延碛。莫贺延碛地近敦煌,在唐代是由沙州(今敦煌)、瓜州(今甘肃安西)转道伊州(今新疆哈密)的必经之地,其名当为西北一带民众所熟知。莫贺延碛并不在长城附近,也不是孟姜女故事的发生地,它在该文中的出现,很有可能是讲唱者有意无意地将自己与听众都熟悉的地名加入了变文中。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可以将莫贺延碛视为一个象征性的意象,其意义是泛指性的,指代广袤荒凉的北方边地。这显示了变文的发展,也显示了讲唱所流传的地域及民众的地理知识对于变文文本形成过程的影响。

2. 该文与 P.5039《孟姜女变文》的关系

敦煌遗书中,《孟姜女变文》尚有 P.5039 一号,该号亦残缺严重。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将 P.5039 与 P.5019 视为同一篇变文的两个片断,把 P.5019 录文置于 P.5039 之后。通过对这两段变文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一编排值得商榷。

P.5039 首尾俱缺,残存八百馀字。全文起自“珍重送寒衣”,次叙哭倒长城,随后铺陈寻夫骨、与髑髅对话及祭奠亡夫等情节。从故事情节发展逻辑的角度看,这段残文应是全文的后半段。

P.5019+BD11731 残文首先描述筑城的艰辛与苦楚(“强强台身”“疮痍秣垓如鱼鳞”“被伤”),随后描写盼望归还家乡的感情,最后以孟姜女的口吻表达了对杞梁的思念与忠贞。综观这段文字的内容,显然是孟姜女“送寒衣”前铺陈背景之词。可见,这段文字为《孟姜女变文》全文前半段之残片,可与 P.5039 号前后对照。

3. 背面变相的内容及其与正面变文的关系

此残片背面绘有图画,为变文与变相结合的最典型实例之一。P.5019v《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名为《画稿》,《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拟名《白画背笈人》,显然未将正面之文与背面之图联系起来考察。郭在贻等所著《敦煌变文校议》为其拟名《孟姜女变相》,我们认为这是极有见地的。

《敦煌变文校议》认为:“此图所画实为孟姜女一人往返搬运的两个特写镜头:身负竹筐,脚着长靴,顶盘云髻,一往一返地搬运于断壁残垣之间,正与变文中‘更有数个髑髅,无人搬运’及‘角束夫骨,自将背负’等描写相合。”^①这一论断为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及周绍良等《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

^①郭在贻、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议》,岳麓书社,1990年,第62页。

辑校》所继承^①,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赞同^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幅图画所绘为“两个人用竹筐背土筑墙”^③,即认定这幅图所绘为杞梁筑城的情节。

缀合以后的图画更为完整,我们得以加深对于《孟姜女变相》的认识。

《孟姜女变相》残图为墨笔所绘,构图与笔画均较简洁。其主体为群山之间的一段长城城墙,右侧部分(BD11731背)绘有四人,其中三人各手持一件长柄工具,另有一人位于城墙后,仅露出头部;左侧部分(P.5019v)绘有背着背篓的两个人物,城墙后另有一人,仅露出头部。所有人物均高髻阔面,具有明显的佛教绘画特点,显示了佛教艺术对世俗画的影响,或即出自佛教画家之手。

从笔画简单的残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右侧部分所绘人物所持工具为夯木或钬之类的建筑工具,工具或扬或垂,整幅图所表现的显然是修筑长城的场景,与正面描写劳役艰辛的文字相表里,配合颇为紧密。左侧部分背篓人即是运送建筑材料的场景,与P.5039号背负夫骨的情节应无关联。

这一幅残图描绘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场景,它极有可能是连环画型变相的其中一幅。画面两侧的山峰形象,在提示背景的同时,可能也起到了区隔长幅图画的不同场景的作用。

变文与变相常相辅而行。在敦煌写卷中,变文与变相有多种组合方式。其一为变文变相相间写绘。国家图书馆所藏BD00876《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正文间留有多段无字空白,显然为预留的绘图空间,形制较为特殊。虽然作品未最后完成,但其规制有迹可循,可以推知。该卷卷尾有题记“后有众生同发信心,写画^④《目连变》者,同池(持)愿力,莫堕三途”,明确将“写”与“画”并提,显示抄写变文与绘制变相为互相配合的活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变文与变相的关系。其二为正面抄写变文背面绘变相。P.4524《降魔变文》背面绘有《降魔变相》,是这一类型的范例。P.5019+BD11731亦为此一类型的代表性写卷,同样是体现变文与变相关系的重要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①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62页;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②李小荣:《变文变相关系论》,《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第61页。

③罗宗涛:《读“敦煌所发现的佛教讲唱文”》,《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学卷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375页。

④《敦煌变文集》“写画”录作“写尽”,《敦煌变文校注》等沿用。查原卷(图见封二)“画”字后补,补于“写”右下方,为题记写成后补写的字。细审字形,当为“画”字。“画”“尽”二字的字形辨析,参看黄征《敦煌俗字典》“画”“尽”二条。

